

性探索

——多做少说的七〇年代

何春蕤

不管父母师长或辅导专家们如何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的青少年：「性是一件既自然又美好的事情」、「性是一件你找到终生的伴侣才可以做的事情」、「性是两个人之间非常严肃神圣的活动」、「性是包含着义务与责任的享受」；不管成年人以多么急迫紧张的眼神和语调细数众多因性失足，悲剧以终的虚实故事做为恫吓——我们每一代情欲波动、跃跃欲试的年轻孩子们总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义无反顾的探索自己和彼此的身体，寻求愉悦抒泄的泉源，在无数试验实验的经验中累积出他们对性的认知。因为，性欲是那么一股沛然莫之能「驭」的力量。

虽是在九〇年代的眼界中回顾七〇年代青少年的性探索活动，我们却发现当年的冲动与创意一点也不输给今日，其间的差异大概只是今日青少年的情欲活动愈来愈和商业活动分不开，这也就是说，情欲被资本主义金钱逻辑渗透甚深，以至于情欲活动或情欲表达都需要借助商品（花、礼品、名牌衣着、狄斯可等），才能进行。

七〇年代的情欲空间其实也很多样，其共通点则是经济上的耗费较少。以当时最流行的家庭舞会为例，只要父母不太严厉，愿意让出客厅来给孩子争个面子，孩子便可呼朋引伴，借得各方的唱片，

调点果汁，撒上滑石粉，在自己家中名正言顺的扭暗灯光，进行最起码的肢体接触。参加舞会的朋友通常一点钱也不花，只要帮忙打杂就可以了。

这种纾解情欲的活动由于多半是在朋友之间扩大邀约，因此情欲的网路也沿着原有的人际关系向外扩散，由同学、玩伴扩散到他们的同学和玩伴，很少有像九〇年代那种与全然的陌生人进行情欲试探的各式场所（如狄斯可、PUB、来电交友中心等）。

家庭舞会既然提供一个多多少少有人际关系基础的安全环境，再搭配着当时大量输入的慢拍西洋情歌舞曲，不少青少年男女因此得以沈缅在昏暗但稳定温暖的气氛中，随着旋律和舞步逐渐进入情况，在相拥中感受异性身体的刺激，初识不久便跳三贴舞的男女不在少数。这种缓慢舒展但热情澎湃的情欲，十分适合当时还颇依赖人际交往的青少年，不似九〇年代习惯疏离和原子化的青少年们在震耳欲聋、词调不清但节奏狂野的音效及闪烁着不安变化的灯光干冰中爆发着自我身体的能量与情欲。

七〇年代家庭舞会是在集体的场域中隔着衣物感受身体贴合的触感，如果希望更进一步探入衣物，往往就需要转进更私密的空间去。在许多青少年没有自己的房间，又不想被家人监督的状况下，黑咖啡馆应运而生。在高背座椅、浓密盆栽、和昏暗的灯光中，一对对情侣在卡座中探索身体的极限，从亲吻、爱抚到互相手淫都是例常的公式，少数欲火燃烧得比较烈同时又比较有创意和胆量的情侣，甚至可以不脱衣服地在狭窄的椅子上坐着性交。黑咖啡馆的多功能性质也因此使它成为七〇年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情欲文化地标。

在性刺激与性诱惑的图像尚未大量进驻媒体的七〇年代，情欲虽然缓慢舒展却丝毫不减其强度。

入夜之后，另外一些不太耗费金钱的黑暗角落开始人影幢幢，不但有热情的情侣，也有饥渴的窥视者。当时新近完工，地形转折，树从很多的国父纪念馆或故宫博物院，各个大小公园，甚至施工中的大厦国宅工地，都是热门去处。故宫博物院对面的民宅一到傍晚就开始向骑摩托车经过的情侣拉客寄车，传闻故宫的清洁人员一大早就得先清除散落在草地树丛间的大量卫生纸团，以免妨碍观瞻，由此可见夜间活动之兴旺。

我们一般的印象总觉得男性的性生活比女性来得活跃，但是以七〇年代的时代背景来看，恐非如此。越战期间驻扎在远东的美国军人以台湾为极其重要的休假地点，不管大兵们本来是否已经结婚，到了异国，挟其帝国主义殖民经济的优势，莫不想在本地女性身上寻求慰藉。于是，不少出路有限，前途无亮的眷村女子占地利之便，发展出许多异国恋情或投入非职业性的伴游同居，反正短暂的欢愉也是欢愉。此外，七〇年代初露端倪的青少年问题之一就是逃家少女的涌现。这些「落翅仔」经常在西门町闲逛，以身体换取些许金钱或过夜地点。她们和卷入异国关系的女性一般，很早便已挣脱了贞操观念的束缚，而且累积了不少异质的性经验，有些或许终究坠入风尘，但是也有许多后来默默带着她们个人的故事遁入婚姻家庭。

这些特殊的历史因素为当年的女性开创了更多以性活动为主要目标及内容的交往关系，如果再和前面说的那些一般的性探索连起来看，我们发现七〇年代的性活动一点也不贫乏。

事实上，在一九八二年优生保健法使人工流产合法化之前，台湾地区的堕胎比例已十分可观。由于保险套尚未普及，青少年多半倚赖计算安全期或断断续续服用的避孕药来实行避孕，意外失手的比

例很高。有统计数字显示七〇年代的堕胎率已达百分之十一·八，这当然包括了已婚妇女的堕胎数字，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在堕胎合法化之前，许多手术——特别是未婚少女的堕胎——不会报给官方，那么，即使扣去已婚妇女可能占去的一大部分，未婚妇女的堕胎率仍然不低。这也间接证实了七〇年代性活动的频繁。

指出七〇年代性活动的频繁并不意味着这种探索和享受的分配是平均而普遍的：都会区的机率和频率还是比乡村高很多，中上阶层的青少年也比其他青少年更倾向性开放。但是一般来说，由于情欲空间和花费都还算经济，青少年男女交往也还未被吸纳进入市场的金钱逻辑，因此情欲探索很有个别色彩，而且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加入的。时至九〇年代，花费较少的情欲空间愈来愈难找，最起码的前奏暖身活动也往往要坐落在昂贵的情人套餐和豪华的休闲场所中进行，居于初识和上床之间的过渡空间（如黑咖啡馆）几乎付之阙如，起而代之的是对当代文化最具影响力的硬体装备：汽车。这个退可暖身进可直攻的交通工具把情欲活动由都会扩散到乡间的度假场所，但同时也更紧紧的把情欲活动关进了汽车和宾馆的内部密闭空间。而汽车所代表的金钱实力也使情欲活动渐次两极化，有车的那一端在情欲活动上大占便宜，无车的那一端则困难重重。情欲资源的积累不再像七〇年代那样沿着人际关系进展，而是沿着资本主义的金钱逻辑来扩大，使优势阶层的子弟得到更多的情欲满足。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的情欲发展意味着中上阶级的情欲空间和流动性扩大，这个解放是和下层阶级无缘的。

对于活过七〇年代并在其间尝试性探索、累积性经验的人而言，九〇年代的情欲活动似乎太现实太任性了一些，但是这个印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九〇年代有关性、有关两性人际关系变迁的众多论述

来建立的。七〇年代的情欲活动没有人述说，我们拥有的遗迹只是形诸规范、见诸政策的压抑措施，以及口耳相传的失足故事和父母师长的殷殷劝诫，或许这些围堵的迹象正标示了那个「多做少说」的时代。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九〇年代狂热出匭的情欲恐怕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七〇年代把情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强度，按着「情欲如过河卒子，有进无退」的原则，我们在九〇年代需要愈来愈强、愈来愈禁忌、愈来愈多样的性刺激才能达成情欲的满足。

如果说七〇年代的青少年在摸索中发现了彼此的身体和情欲，那么，或许九〇年代的我们有机会在他们的情欲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身体观。这个新身体观相信身体不是用来交换金钱、爱情或婚姻的手段，身体的愉悦本身就是目的；它也相信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被当成性器官来获取愉悦，无处不是情欲。在这个多做也多说的年代中，只有人人都来说、大家动手写的各式情欲故事可以对抗那些企图压抑情欲的性论述。

我们期待情欲出匭文学时代到来。